

# 外群歧视与农民工城市创业

周战强 李彬 易成栋

**摘要** 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来实证分析农民工遭受的外群歧视与其城市创业行为的关系,可以发现:外群歧视明显抑制了农民工的城市创业行为。形成这一影响的机制是外群歧视减少了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降低了对他们的社会尊重程度,进而抑制了其城市创业行为。外群歧视对雇主和自营劳动者这两类创业活动都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对前者的抑制作用更大。另外,新生代、跨省流动、东部地区农民工的城市创业行为受到外群歧视的抑制作用要更大一些。农民工大量流入的城市应该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减少对农民工的外群歧视,并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以激发农民工城市创业的活力。

**关键词** 农民工;外群歧视;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社会尊重;城市创业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2)01-0130-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BRK017);中央财经大学标志性科研成果培育项目(20200075)

自2014年9月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来,全国掀起了一股创业创新的热潮。农民工是大众创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根据2017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数据,外出农民工创业的比例为41.68%,而当年外出农民工为1.72亿<sup>[1]</sup>,据此推算,大约有0.72亿外出农民工从事各类创业活动。可见,农民工已经成为流入城市的大众创业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于制度、地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作为流入城市的外来群体,不可避免会遭受城市居民或机构的不公平对待,即外群歧视<sup>[2]</sup>(P90-98)。这种歧视使他们处于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降低了他们获取外部资源和支持、扩展社会资本的可能性,不利于他们的创业行为。虽有一些文献关注环境因素对创业的影响<sup>[3]</sup>(P491-516)<sup>[4]</sup>(P46-66)<sup>[5]</sup>(P118-128)<sup>[6]</sup>(P81-91),但是鲜有文献分析外群歧视与创业的关系。笔者利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来实证分析外群歧视对农民工在流入城市创业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对于优化农民工创业外部环境,推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等都有重要意义。

## 一、文献综述

农民工在流入城市的创业行为主要受两类因素的影响。一是自身禀赋因素,主要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物质资本是创业的重要基础,财富或资金越多,越可能选择创业<sup>[7]</sup>(P71-89)。人力资本对创业的影响比较复杂。叶静怡等人认为教育或培训提高了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高或受过培训的外来劳动力更容易创业<sup>[8]</sup>(P93-102),而在物质资本约束下,受教育程度高或有培训经历的人更容易找到有吸引力的工资的工作,选择创业的可能性反而降低<sup>[9]</sup>(P123-145)。农民工在外地创业,离不开其社会资本的支持。老乡、朋友或同事等社会关系网络使他们更容易获得创业信息和创业机会,更容易获得民间借贷,突破自有物质资本约束,更容易在创业初期尽快盈利,也更可能进行创业<sup>[10]</sup>(P1-21)<sup>[11]</sup>(P1-

17)。二是环境因素。从营商环境看,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激发创业活力<sup>[12]</sup>(P57-68)。高效的政府能够降低创业活动成本,提高经营效率,促进创业活动<sup>[3]</sup>(P491-516)。放松进入规制可以降低开办企业的难度,提高企业家的创业积极性<sup>[4]</sup>(P46-66)。从文化环境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业文化会对其创业活动有积极影响,倡导个人自主性、冒险性、创新性的文化能提高个人创业的概率<sup>[5]</sup>(P118-128)。地区文化差异能促进流动人口的创业行为<sup>[13]</sup>(P146-156)。从社会环境看,社会信任能促进信息交流,减少融资约束,进而提高农民工创业的可能性<sup>[6]</sup>(P81-91)。

可以看出,现有研究为理解农民工创业行为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洞见,然而并未涉及农民工受到的外群歧视对其创业行为的影响。

农民工受到的外群歧视是户籍制度、文化、地域等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户籍制度是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把居民分为农民和市民两个群体。两类居民在教育、就业、住房、医疗、社保、福利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不仅使他们在经济地位上不平等,还在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别,从而导致市民相对于农民存在优越感。随着越来越多农民工进入城市求职发展,市民生活和工作空间受到不同程度的挤压,自身的相对优势地位、资源和机会等受到威胁,于是就对农民工这一外来群体产生了外群歧视<sup>[14]</sup>(P215-23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民工政策从最初的严格禁止到后来的逐渐放开,对他们的歧视性政策和不合理规定不断减少<sup>①</sup>。近些年来,我国一直在努力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但是农民工在经济、政治、公共服务和社会关系等多方面得不到流入城市的接纳和包容,仍然能感受到外群歧视,在城市融入度较低<sup>[15]</sup>(P38-41),这对其心理和经济行为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有鉴于此,本文采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探讨外群歧视对农民工在流入城市创业行为的影响。

笔者主要从外群歧视角度研究农民工的创业行为。在劳动市场上普遍存在着歧视现象,人们主要关注性别、种族、户籍、地域或收入等方面歧视对创业的影响,但是忽视了外群歧视的作用。外群歧视与单纯的户籍歧视、收入歧视和地域歧视不相同,是包括上述因素在内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分析外群歧视对创业的影响,有助于拓展现有关于迁移人口创业研究的视角,丰富该领域的研究内容。同时笔者还在分析中利用了歧视的直接测度变量。现有关于歧视与就业或创业关系的实证研究一般采用虚拟变量系数或收入差距分解中的无法解释部分来说明歧视程度,如果存在与人力资本、生产特征等有关的遗漏变量,估计结果就可能出现偏差<sup>[16]</sup>(P3143-3259)。一种可能的改进方式是直接测度歧视程度,分析其影响。本文借助调查数据,构造外群歧视的直接测度指标并进行分析。

##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农民工的创业选择是基于自身条件做出的理性选择。如果他们认为创业带来的预期收益高于成本,就倾向于选择创业,否则就倾向于采取其它就业方式。创业的预期收益和成本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创业制度环境的影响。创业的制度环境包括正式制度环境<sup>[17]</sup>(P4-6)和非正式制度环境。外群歧视是农民工创业过程中面临的非正式制度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在流入城市是“外来人”和“农村人”,相对于流入城市市民而言,农民工就是“外群”。外群歧视是城市市民相对优势地位、资源和机会等受到威胁的一种反应<sup>[14]</sup>(P215-230),对农民工创业决策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由于存在外群歧视,农民工未能享受到与流入城市市民一样的待遇,在市场准入、融资便利、财税优惠等方面存在差异,处于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之中,或者在创业过程的某一或某些环节,可能额外增加成本开支,导致创业的可能性下降。(2)农民工在流入城市创业,其客户、供应商等多为流入地居民。外群歧视不利于农民工在流入

<sup>①</sup> 2003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取消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规定、不合理收费等措施,保障农民工权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农民工的歧视。

城市社会关系网络的拓展,降低了创业可能性。(3)创业是一种相对复杂的非常规性活动,需要较强的逻辑判断。外群歧视会损害农民工的认知表现,使他们在复杂任务、逻辑思维等方面表现较差<sup>[18]</sup>(P102-117),这对创业有不利影响。(4)外群歧视会导致农民工对外部环境产生消极评价<sup>[18]</sup>(P102-117),较担忧创业失败或新创企业的未来发展,减少冒险行为,降低了创业的概率。

外群歧视对农民工城市创业的影响有可能借助下述三种途径实现:

一是社会资本途径。创业往往需要借助融资才能开展,但创业者和资金提供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社会资本可以有效缓解这种信息不对称,给资金提供者传递创业者的信息,弥补创业者缺少抵押品的缺陷,缓解其融资约束和违约风险,增加创业的可能性<sup>[10]</sup>(P1-21)<sup>[11]</sup>(P1-17)。对于进城的农民工而言,其原有社会资本发生了断裂,需要在流入地重新积累社会资本。他们在流入地的社会资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利用亲戚、老乡等形成“强联系”的社会资本,另一类是通过工作和各种方式参与社会活动建立起来的“弱联系”的社会资本。受到外群歧视的农民工被城市市民看不起,会产生“过客”心理,更愿意与“内群”的人交流,而不愿或不太愿意与“外群”的城市市民交流,参加他们组织的一些社会活动,而且城乡二元化的制度结构使农民工在城市中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减少了他们与城市人交流的机会,这样就减少或抑制了后一类社会资本的积累。然而这类社会资本在创业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它一方面能为创业者提供大量的重要信息,这种信息与亲缘、地缘关系等“强联系”社会资本提供的信息相比,更具有广泛性、异质性<sup>[19]</sup>(P1360-1380),另一方面能帮助创业者获得生意,为其产品或服务提供销售渠道和对象,保证经营的持续性,提高经营效益<sup>[20]</sup>(P78-97)。如果没有充分可利用的“弱联系”的社会资本,就难以获得创业所需要的资源和支持。

二是人力资本途径。人力资本一般包括个体的教育、培训、经验等,可以通过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就业等方式进行积累。根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的数据,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虽然不断提高,但普遍水平较低。2020年农民工中小学及其以下、初中、高中及其以上文化程度占比分别为15.7%、55.4%、28.9%,以初中及其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为主<sup>[21]</sup>。外出农民工接受的培训是提高其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然而外群歧视会导致培训机会的不平等。流入城市的相关部门和机构更关注城市市民的就业和发展,更愿意将培训机会提供给城市市民,导致农民工获得较少的培训机会。外群歧视会损害农民工的认知表现,而且会为农民工带来消极情绪体验<sup>[18]</sup>(P102-117),这种消极情绪也会间接影响其认知判断。受外群歧视和社会资本劣势的影响,农民工人力资本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sup>[22]</sup>(P34-38),这降低了其人力资本的可能回报,进而降低了他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人力资本积累不仅能够提高个体的生产能力,还能够提高个体的资源配置能力<sup>[23]</sup>(P827-846),这两种能力对创业者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三是社会尊重途径。社会尊重是指个体希望得到别人的信赖和积极评价。社会尊重是一种人际态度,更多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sup>[24]</sup>(P1136-1140)。外群歧视会损害人际关系以及个体的自尊,减少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尊重。外群歧视不是以品行、能力和贡献而是以户籍、地域等因素为依据,对农民工进行不公平或不平等的对待。虽然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和繁荣做出重要贡献,但得不到城市的接纳和认同,感受不到人格的自由和尊严,自身权利受到剥夺,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尊重<sup>[25]</sup>(P21-23)。社会尊重会影响个体的创业选择。Jackson和Rodkey认为,如果一个地区的公众尊重新的和小的创业者,有助于形成一种支持新企业创立、生存与成长的氛围<sup>[26]</sup>(P358-380)。这种氛围能促进农民工对创业机会的感知及从事创业的意愿,有利于创业行为的发生<sup>[27]</sup>(P98-105)。同时,得到社会尊重能使农民工对自己充满信心,产生更多的责任感,觉得自己更有能力<sup>[28]</sup>(P33-39),有助于激发他们的创业激情。可见,外群歧视可能通过降低对农民工的社会尊重程度,减少其城市创业行为。

根据以上分析,可提出下列研究假设:

假设1:外群歧视会降低农民工城市创业的概率。

假设2:外群歧视会通过减少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积累,进而降低其城市创业概率。

假设3:外群歧视会通过减少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进而降低其城市创业概率。

假设4:外群歧视会通过减少对农民工的社会尊重程度,进而降低其城市创业概率。

### 三、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原国家卫生计生委2014年进行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中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专题调查。该专题调查包括受访者个人和家庭基本信息、就业状况、社会融合状况等内容,采用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方法,在北京市朝阳区、浙江省嘉兴市、福建省厦门市、山东省青岛市、河南省郑州市、四川省成都市、广东省深圳市和中山市8个城市(区)进行。被访流动人口年龄为15-59周岁,户籍不在本区(县、市),且居住在当地1个月以上。每个城市(区)样本量为2000人,总样本量为16000人。由于本研究考察的是农民工在流入城市的创业行为,因此删除了样本中非农户籍人口和流入农村的农业户籍人口,最后保留下来的样本量为11853个。

本文研究变量包括创业选择、外群歧视、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社会尊重、农民工个人和家庭特征、流动特征等变量。

1.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创业选择(*entrep*),在文献中常采用是否开办私营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衡量创业选择<sup>[29]</sup>(P2399-2428)<sup>[30]</sup>(P66-75)。本文借鉴这一方式,把受访者选择为雇主和自营劳动者,归为创业行为,*entrep*=1,否则,*entrep*=0。在整个样本中,32.30%的农民工选择了雇主和自营劳动者的创业行为(见表1)。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代码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创业选择	<i>entrep</i>	0.3230	0.4676	0	1	10719
外群歧视	<i>discrim</i>	1.8705	0.6229	1	4	11852
社会资本	<i>s_capital</i>	0.3800	0.4854	0	1	11852
人力资本	<i>training</i>	0.3093	0.4622	0	1	11852
社会尊重	<i>respect</i>	5.0880	1.7386	1	10	11852
性别	<i>gender</i>	0.5443	0.4981	0	1	11853
年龄(1990年及以后出生)	<i>age_d1</i>	0.1972	0.3979	0	1	11853
年龄(1980-1989年出生)	<i>age_d2</i>	0.4259	0.4945	0	1	11853
民族	<i>nation</i>	0.9674	0.1775	0	1	11853
文化程度(高中)	<i>edu_h</i>	0.2636	0.4406	0	1	11853
文化程度(大学)	<i>edu_c</i>	0.1017	0.3022	0	1	11853
婚姻状况	<i>marriage</i>	0.7202	0.4489	0	1	11853
家庭规模	<i>fami_size</i>	2.8454	1.2585	1	9	11853
家庭劳动力占比	<i>labor_rate</i>	0.7844	0.2029	0	1	11853
家庭困难	<i>home_diff</i>	1.7831	1.5057	0	8	11853
流动时间	<i>floyear</i>	4.2230	4.4589	0	33	11853
流动时间平方项	<i>floyearsq</i>	37.7132	78.3926	0	1089	11853
流动范围	<i>florage</i>	0.5096	0.4999	0	1	11853
流出地区(东部)	<i>resi_place_d1</i>	0.3439	0.4750	0	1	11853
流出地区(中部)	<i>resi_place_d2</i>	0.3668	0.4820	0	1	11853

2. 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外群歧视(*discrim*),文献中对该变量的衡量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采用社会距离<sup>[31]</sup>(P605-622),另一种是采用外来者感受到的本地人对他们的态度<sup>[2]</sup>(P90-98)。在本研究采用的调查问卷中,社会距离的问题是从外来者的角度提出的,更多反映的是外来者的主观意愿,没有揭示出外群歧视的特征,因此本研究借鉴后一种方式衡量外群歧视。采用调查问卷中的问题

“我觉得本地人不愿与我做邻居”“我感觉本地人不喜欢我”“我感觉本地人看不起我”来衡量农民工遭受到的外群歧视程度。每个题目都有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4个选项,将它们依次赋值为1、2、3、4。用受访者对上述3个题目的回答赋值加总后除以3表示外群歧视状况(*discrim*),数字越大代表农民工遭受的外群歧视程度越严重。该变量均值为1.8705(见表1),说明农民工感受到的外群歧视较轻。

3. 影响途径或机制变量。借鉴 Cheng 和 Smyth 的研究<sup>[32]</sup>(P506-529),本文采用社会活动参与衡量社会资本(*s\_capital*)。它可以使用受访者在本地活动参与情况表示。该问卷中参与本地活动可归结为7项:社区文体、社会公益、选举、评优、业主委员会、居委会管理及其它活动。如果受访者参加过任何一项,*s\_capital*=1,否则,*s\_capital*=0。样本中有38%的农民工至少参加过其中一项活动,可见他们参与本地活动的积极性有限(见表1)。

参考杨菊华的研究<sup>[33]</sup>(P48-57),本文采用政府培训衡量人力资本(*training*)。它可以利用受访者对“近三年中,您在本地接受过政府提供的免费培训吗”这一问题的回答来测度。如果接受过政府的免费培训,*training*=1,否则,*training*=0。样本中仅有30.93%的农民工参加过政府的免费培训,可见政府培训的供给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见表1)。

借鉴邹静和邓晓军的研究<sup>[34]</sup>(P2-17),本文采用尊重认知衡量社会尊重(*respect*)。它可用问卷中有关受人尊重的问题“与全社会的人们相比,您处在哪个位置”的回答来测度。该问题的选项为1到10,数值越大代表越受人尊重。样本中农民工感受到的平均尊重程度为5.0880,处于中等水平(见表1)。

4. 控制变量。基于数据的可及性,本文控制了下述两类变量:一类是农民工个人及家庭特征,包括性别(*gender*)、年龄(*age*)、民族(*nation*)、文化程度(*edu*)、婚姻状况(*marriage*)、家庭规模(*fami\_size*)、家庭劳动力占比(*labor\_rate*)、家庭困难(*home\_diff*)<sup>①</sup>。如果农民工为男性,*gender*=1,如为女性,*gender*=0。样本中男性多于女性,所占比例为54.43%。本文引入了两个虚拟变量表示农民工的年龄<sup>②</sup>。如果农民工是1990年及其以后出生,*age\_d1*=1,否则,*age\_d1*=0;如果他们是1980-1989年出生,*age\_d2*=1,否则,*age\_d2*=0。样本中1980年及其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多数,所占比例为62.31%。如果农民工为汉族,*nation*=1,否则,*nation*=0。样本中绝大部分农民工为汉族,占96.74%。农民工受过初中及其以下、高中、大学教育的比例分别为63.47%、26.36%、10.17%,可见大多数受访农民工的文化程度较低。本文利用两个虚拟变量表示文化程度,如果农民工受过高中教育,*edu\_h*=1,否则,*edu\_h*=0;如果农民工受过大学教育,*edu\_c*=1,否则,*edu\_c*=0。从婚姻状况看,有配偶民工占大多数,比例为72.02%。农民工的家庭平均规模在2.8454,劳动力在整个家庭的平均占比为78.44%。家庭困难是指受访农民工在老家的困难或需要操心之事,包括老人赡养、子女照看及教育费用、配偶生活孤独、家人有病缺钱治、干活缺人手、土地耕种及其它,如有上述一项困难就记为1,否则记为0,然后进行加总,形成一个计数变量,表示家庭困难。该变量的均值为1.7831,说明家庭困难不多。另一类是流动特征变量,包括流动时间(*floyear*)、流动范围(*florage*)、流出地区(*resi\_place*)等。流动时间以本次流动的时间长度表示,平均为4.2230年。流动范围根据是否跨省流动进行了区分,如果跨省流动,*florage*=1,如果省内流动,*florage*=0。过半数的民工是跨省流动,占比为50.96%。农民工的流出地区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sup>③</sup>,分别占34.39%、36.68%、28.93%。如果农民工来自东部地区,*resi\_place\_d1*=1,否则,*resi\_place\_d1*=0;如果来自中部地区,*resi\_place\_d2*=1,否则,*resi\_place\_d2*=0(见表1)。另外,样本中农民工流入城市共8个,本文采用中山市作为基准,设置7个虚拟变量*city\_name1-city\_name7*表示流入城市。

① 本文没有控制收入变量,因为收入内生于因变量创业选择,如果将其加入模型,会导致参数估计偏误。实际上,本文也尝试了将受访者家庭在流入地的每月人均收入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估计结果并未改变。

② 本文没有采用将年龄及其平方项放入模型的方式,因为这会带来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③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和广西。

####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部分首先通过对基准模型及影响途径的实证分析,检验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然后,基于创业类型和不同的群体特征进行异质性分析;最后,处理模型内生性问题并进行稳健性检验。

##### (一) 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分析

由于被解释变量是虚拟变量,本文利用下述Probit模型作为分析外群歧视对农民工城市创业影响的基准模型:

$$Pr(entrepreneur_{ij} = 1) = \Phi(\alpha discrim_{ij} + \beta X_{ij} + \gamma_i) \quad (1)$$

其中*i*代表流入城市,*j*代表受访农民工。*entrepreneur<sub>ij</sub>*表示流入第*i*个城市的第*j*个受访农民工创业选择。*discrim<sub>ij</sub>*表示流入第*i*个城市的第*j*个受访农民工感受到的外群歧视状况。*X<sub>ij</sub>*是一系列可能影响农民工创业决策的因素,包括农民工个人和家庭特征、流动特征等。 $\gamma_i$ 表示流入城市固定效应,刻画了不随时间变化的流入城市特征。

表2给出了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模型1是仅有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2为加入了流入城市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模型3是继续加入了受访者个人和家庭特征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4是进一步加入流动特征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随着加入控制变量,外群歧视系数均为负值,其绝对值有所下降,但是都在1%的显著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外群歧视会明显降低受访农民工城市创业的概率,这一结果十分稳健。这证明了假设1。

在控制变量中,从个人和家庭特征看,性别变量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男性较女性农民工城市创业的概率明显要高。这可能是因为女性比男性的平均技能水平要低一些,冒险精神和创业动力要弱一些。两个年龄虚拟变量的系数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新生代较老一代农民工城市创业的概率明显要低。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年纪轻,敢于冒险,创业意愿更强,但是在创业所需要的初始投资、社会资本、技术和经验等方面存在欠缺,可能限制了其创业行为,创业概率反而下降。民族变量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汉族农民工城市创业的概率明显要高。两个文化程度虚拟变量的系数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工城市创业的概率明显要低,可能原因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工更易被吸引到稳定报酬的工作上,创业的概率反而下降。婚姻变量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有配偶的农民工城市创业的概率明显要高。这可能与有配偶者比没有配偶者获得的家庭情感帮助和物质支持更多有关。

家庭规模变量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家庭规模越大,越可能创业。大规模的家庭更能为创业者提供资金、人力和情感支持。家庭劳动力占比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家庭劳动力比例高的家庭,创业的概率明显要低。劳动力占比高的家庭达成一致决策的难度要大一些,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创业的可能性。家庭困难变量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家庭困难较多时创业的概率明显要低。创业是有风险的活动,家庭困难多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创业这类冒险活动。

从流动特征看,流动时间及其平方项的系数分别为正值和负值,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外出打工年限与创业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外出时间较短和较长的民工城市创业概率要低。流动范围变量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跨省流动民工比省内流动民工城市创业的概率明显要高。跨省流动者可能更有冒险精神,从事创业的可能性相对要大。两个反映流出地区虚拟变量的系数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相对于来自西部地区的民工而言,来自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民工城市创业的概率明显要高。这可能是因为东中部地区居民比西部地区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要高,具备更多的创业物质资本。

表2 基准模型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外群歧视	-0.1547*** (0.0206)	-0.1168*** (0.0212)	-0.1116*** (0.0224)	-0.0900*** (0.0227)
性别			0.1339*** (0.0274)	0.1321*** (0.0278)
年龄(1990年及以后出生)			-0.4367*** (0.0587)	-0.3220*** (0.0606)
年龄(1980-1989年出生)			-0.1807*** (0.0334)	-0.1375*** (0.0344)
民族			0.4962*** (0.0937)	0.3573*** (0.0951)
文化程度(高中)			-0.1090*** (0.0328)	-0.1305*** (0.0334)
文化程度(大学)			-0.4648*** (0.0540)	-0.5000*** (0.0550)
婚姻状况			0.4688*** (0.0604)	0.4468*** (0.0612)
家庭规模			0.1803*** (0.0206)	0.1722*** (0.0209)
家庭劳动力占比			-0.3747*** (0.0933)	-0.2974*** (0.0946)
家庭困难			-0.0793*** (0.0093)	-0.0620*** (0.0095)
流动时间				0.0503*** (0.0083)
流动时间平方项				-0.0013*** (0.0005)
流动范围				0.1528*** (0.0417)
流出地区(东部)				0.7560*** (0.0522)
流出地区(中部)				0.3004*** (0.0467)
流入城市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1732*** (0.0400)	-0.5219*** (0.0578)	-1.5840*** (0.1689)	-2.1567*** (0.1779)
Wald $\chi^2$	56.42***	250.74***	1554.98***	1755.14***
Pseudo R <sup>2</sup>	0.0042	0.0187	0.1452	0.1703
N	10718	10718	10718	10718

注:括号中的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后同);为节省篇幅,后文表格都省略了控制变量系数的估计结果。

## (二) 影响途径的估计结果分析

前文假设外群歧视会通过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社会尊重途径影响农民工城市创业,下面对这三条途径进行实证检验。

首先是社会资本途径。为了验证外群歧视是否通过减少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积累,进而影响其城市

创业的概率,本文使用社会资本(*s\_capital*)作为被解释变量,与上述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一起构建 Probit 模型,具体估计结果见表3模型1。可以看出,外群歧视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它明显降低了农民工拥有社会资本的概率,可见外群歧视可以通过减少社会资本积累进而对他们的创业行为产生了不利影响。这证明了假设2。

表3 影响途径的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社会资本	人力资本	社会尊重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外群歧视	-0.0870*** (0.0215)	-0.0911*** (0.0224)	-0.3038*** (0.03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R <sup>2</sup> /Pseudo R <sup>2</sup>	0.1109	0.1264	0.0389
N	10718	10718	10718

其次是人力资本途径。为验证外群歧视是否影响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影响其创业活动,本文利用农民工的受培训情况(*training*)作为被解释变量,与上述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一起构建 Probit 模型,估计结果见表3模型2。可以看出,外群歧视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可见它明显降低外来农民工接受培训的概率。这说明外群歧视可以通过降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减少其创业行为的可能性。这证明了假设3。

最后是社会尊重途径。为了验证外群歧视是否通过影响对农民工的社会尊重程度进而影响其创业的概率,本文用社会尊重(*respect*)作为被解释变量,与外群歧视变量、上述控制变量构建 OLS 模型,具体估计结果见表3模型3。可以看出,外群歧视对社会尊重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它显著降低了对农民工的社会尊重程度,可见外群歧视通过降低对农民工的社会尊重程度进而减少他们城市创业的概率。这证明了假设4。

### (三) 异质性分析

前面分析说明了外群歧视影响农民工城市创业的概率,这一影响在不同创业类型和不同群体中可能存在差异,需要进一步分析。

1. 基于细分创业类型的分析。在前面分析中,本文把受访农民工选择雇主和自营劳动者归为创业。为分析外群歧视对这两类创业行为的影响是否相同,本文把受访者的就业身份分为三类:雇主、自营劳动者、雇员和其他。以这个包含三个类别的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与前述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构建多项 Probit 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可以看出,在雇主、自营劳动者方程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分别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为负,并且前者的绝对值是后者的3倍多,说明虽然外群歧视会显著降低两类创业行为的发生概率,但是对雇主类创业概率的影响要大得多。根据创业目的,可将创业者分为生存型和机会型两类<sup>[35]</sup>(P348-352)。前者创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就业,有一份谋生的工作;后者的目的主要是看到了有利的商业机会。相对而言,雇主更可能是机会型创业者,自营劳动者更可能是生存型创业者。由于有一部分自营劳动者可能最初在劳动力市场上没有找到合适的就业机会,通过创业来摆脱失业,实现就业,这样外群歧视对雇主类创业的影响要更大一些。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相对于雇主类创业者,自营劳动者类创业在一些情形下更可能是创业与雇员两种就业身份之间的替代选择。外群歧视在降低自营劳动者类创业可能的同时,也会导致对选择雇员就业者的岗位歧视和同工不同酬的工资歧视,进而对选择雇员就业产生一定程度的负向冲击<sup>[36]</sup>(P36-46),这样对自营劳动者类创业反而产生一定程度的正向激励。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外群歧视对自营劳动者类创业的负向效应在此起了主导作用,同时对选择雇员就业的负向冲击部分抵消了这一作用,使得它对雇主类创业的影响更明显。

表4 多项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

变量	雇主	自营劳动者
	模型1	模型2
外群歧视	-0.2602*** (0.0456)	-0.0696** (0.032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Wald $\chi^2$	1912.27***	
N	10718	

2. 基于不同群体的分析。根据农民工的出生年代、流入地区、流动范围可以把他们分为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群体中,外群歧视对农民工城市创业的影响也不同。

(1)基于出生年代的分组分析。将农民工按照出生年代可以分为老一代和新生代两个类别。两代农民工在财富积累、社会资本、工作经历等方面存在差异,外群歧视的影响可能并不相同。为比较外群歧视在两代农民工创业行为上的影响差异,本文将样本分为老一代和新生代的农民工两个子样本,按前述方程(1)回归估计的结果见表5模型1和模型2。可以看出,老一代与新生代农民工中外群歧视都对其城市创业行为产生了显著的不利影响,但是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种效应要稍微大一些。这可能与老一代农民工经历相对丰富、在流入城市工作和生活时间较长、与当地居民交往可能较多有关。

表5 分组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出生年代		流入地区		流动范围	
	老一代	新生代	东部	中西部	跨省流动	省内流动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外群歧视	-0.0775** (0.0351)	-0.0923*** (0.0301)	-0.1069*** (0.0266)	-0.0161 (0.0443)	-0.1142*** (0.0323)	-0.0477 (0.032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Wald $\chi^2$	586.06***	1012.19***	1078.53***	793.48***	847.57***	1001.83***
Pseudo R <sup>2</sup>	0.1188	0.1734	0.1387	0.2716	0.1601	0.1828
N	4093	6625	7487	3231	5399	5319

(2)基于流入地区的分组分析。我国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快,这种差异可能导致外群歧视的影响存在不同。为分析外群歧视的影响是否因流入地区而存在差异,本文把流入地分为两类:北京、嘉兴、厦门、青岛、深圳和中山6个城市归为东部地区,郑州、成都2个城市归为中西部地区。按这两类流入地划分子样本,采用方程(1)的回归估计结果见表5模型3和模型4。从流入地区看,流入东部地区的农民工会因外群歧视而明显降低城市创业的概率,流入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虽然因外群歧视会降低城市创业概率,但是并不明显。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人均收入相对较高,当地人的相对优势感会更明显,对农民工的歧视程度可能相对要大一些,对其城市创业行为的负面影响要更大。

(3)基于流动范围的分组分析。农民工的流动可以分为跨省流动和省内流动,这种流动范围的不同可能导致外群歧视影响的差异。为分析外群歧视的影响是否由此带来差异,本文将样本分为跨省和省内流动两组,利用方程(1)进行回归估计的结果见表5模型5和模型6。可以看出,对于跨省流动农民工来说,外群歧视显著降低其城市创业的概率,但对于省内流动的农民工来说,外群歧视虽然降低其城市创业的概率,但并不显著。这可能与省内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政策环境等差异相对较小有关。另外,跨省流动的农民工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如前所述,在东部地区,外群歧视的作用更明显。

#### (四) 内生性与稳健性分析

首先,上述基准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方面,农民工城市创业活动存在反过来影响其对外群歧视程度主观判断的可能,产生反向因果问题;另一方面,农民工某些未能测度的特征,比如自卑、敏感等个性特征,可能既影响其对外群歧视的主观判断,又影响创业决策,出现遗漏变量问题。为了解决这些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取了下述一些措施。

一是利用工具变量方法。人口流动会导致社会的有价值资源的重新分配,影响流入地居民对群体竞争和威胁感的认知。一个地区的外来人口相对越多,流入地居民越有可能感受到竞争和威胁,进而导致对外来群体不友好,产生歧视<sup>[14]</sup>(P215-230)。所以一个地区户籍迁入人口的相对数量,尤其是从外省(自治区、直辖市)迁入人口的相对数量,与农民工感受的外群歧视有密切关系。但是这一变量与外来农民工的创业行为没有关联。因此本文利用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区县层面数据,计算每个区县迁入人口中来自外省(自治区、直辖市)与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他区县迁入人口的比例,作为 *discrim* 的工具变量。

在采用工具变量的第一阶段回归中,利用工具变量和前文的控制变量对外群歧视变量进行回归。在第二阶段回归中,利用从第一阶段回归中获取的外群歧视预测值作为解释变量,加入前文的控制变量对创业行为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6。可以看出,外生性检验结果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拒绝外群歧视变量是外生的原假设。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拒绝外群歧视变量和工具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可以认为所选的工具变量不是弱工具变量。工具变量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外群歧视预测值的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可见,即使考虑了模型参数估计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外群歧视对农民工城市创业行为仍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表6 工具变量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外群歧视	创业
外省迁入人口相对数量	0.0729*** (0.0142)	
外群歧视预测值		-0.9419*** (0.301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Wald $\chi^2$	2888.08***	
外生性 Wald 检验	5.05**	
弱工具变量 Wald 检验	4.86**	
N	10718	

二是分析遗漏变量的影响。由于一些变量难以测度或数据不易获得,任何研究都会存在遗漏变量问题。问题的关键是遗漏变量对估计结果是否会产生显著影响。Oster提出了一种评估遗漏变量影响的方法<sup>[37]</sup>(P187-204)。她根据有无控制变量情况下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变动以及最大可得  $R^2$ ,即  $R_{max}$ ,计算得到了一个检验统计量  $\delta$ ,来评估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对遗漏变量偏差的稳健性。 $R_{max}$ 是被解释变量对核心解释变量、可观测及不可观测控制变量线性回归的  $R^2$ 。基于对顶级经济学期刊实证研究的分析,她认为  $R_{max}$  等于包含控制变量的 OLS 线性回归中  $R^2$  的 1.3 倍。如果  $\delta=n$ ,就说明遗漏变量要想推翻研究结果,即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为 0,其重要性是可观测控制变量的  $n$  倍;如果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为 0 时  $\delta$  的值大于 1,就表明估计结果对于遗漏变量是稳健的。由于 Oster 的方法是基于 OLS 进行评估的,我们遵循这一思路,间接分析前面估计结果对遗漏变量的稳健性。本研究利用前述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及所有控制变量,计算得到  $\delta=3.040$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估计结果在统计上不可能被遗漏变量偏差所

推翻,对遗漏变量是稳健的。

其次进行稳健性分析。稳健性分析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将问卷中 3 个外群歧视问题利用因子分析方法构建一个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 1,放入模型进行 Probit 回归估计,得到的结果(见表 7 模型 1)与前面一致。将这 3 个问题分别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 2—变量 4,放入模型回归估计,所得结果(见表 7 模型 2—模型 4)与前面一致。二是利用子样本,将样本中就业身份选择“其他”的排除,即仅保留选择“雇员”“雇主”和“自营劳动者”的样本,进行回归估计的结果(见表 7 模型 5)与前面一致。外出农民工流动的原因包括务工经商、随同流动、投亲、婚嫁等,仅保留务工经商一类作为子样本,回归估计的结果(见表 7 模型 6)也与前面一致。

表 7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替代变量 1	-0.0523*** (0.0136)					
替代变量 2		-0.0612*** (0.0200)				
替代变量 3			-0.0738*** (0.0213)			
替代变量 4				-0.0895*** (0.0209)		
外群歧视					-0.0900*** (0.0228)	-0.0909*** (0.022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seudo R <sup>2</sup>	0.1702	0.1698	0.1700	0.1705	0.1709	0.1721
N	10718	10718	10718	10718	10626	10495

## 五、结论与建议

当前我国正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最重要的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促进其社会融合。消除进城农民工遭受外群歧视是农民工社会融合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利用 8 个流入城市(区)的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农民工在流入城市遭受的外群歧视对其创业行为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外群歧视明显抑制了农民工城市创业行为;(2)外群歧视减少了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降低了对农民工的社会尊重,进而抑制了其城市创业行为;(3)外群歧视对雇主和自营劳动者这两类创业选择的影响并不相同,对雇主类创业的可能性影响更大;(4)相对而言,新生代、跨省流动、在东部地区农民工的城市创业行为受外群歧视的负面影响要大一些。

最近十几年来,我国城乡壁垒逐渐松动,但城市居民相对优势地位基本没有改变,外群歧视的客观因素仍然存在。外群歧视会损害社会公平正义,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外群歧视抑制了农民工城市创业,因此,要激发农民工创业热情与活力,应该努力消除他们遭受的外群歧视。首先,应尽快通过户籍、社保等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反歧视的法律法规,将进城农民工纳入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之中,逐步消除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福利差异,给农民工平等的城市居民待遇,让他们平等分享城市发展成果。这是消除外群歧视的基础。其次,本文揭示了外群歧视会通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社会尊重影响创业行为,可以借助这些途径来缓解外群歧视对农民工创业的不利影响。从人力资本看,应整合利用政府、企业、学校、社会公益组织等多种资源,多渠道筹措培训资金,建立常态化的培训机制,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应摸清农民工的需求变化,为

农民工提供切实有效的创业相关知识、技能、政策等培训,提高培训质量。从社会资本看,应鼓励和支持农民工多参与流入城市的各种社会组织和活动,加强与流入城市机构和居民的交流,弱化内外群体的界限,这有助于他们积累异质性社会资本,获取高质量的信息和资源,开展创业活动。从社会尊重看,应充分利用各种传媒工具,积极倡导客观、包容的社会舆论导向,宣传农民工的优秀品质及对城市的贡献,塑造其良好的群体形象,努力消除对农民工的误解、偏见和歧视,形成尊重和平等公平对待农民工的社会氛围,创造公平竞争的创业环境。最后,由于外群歧视对新生代、跨省流动、在东部地区农民工的城市创业行为的影响更大,政府在制定相关公共政策时要考虑到这种差异性,有所侧重,以达到最佳政策效果。

囿于数据的限制,本文没有探讨外群歧视对农民工城市创业的影响是否随时间变化,以及融资约束、社会支持、风险偏好等因素在两者关系中的作用。这些都需要后续加以研究。

### 参考文献

- [1] 国家统计局. 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国家统计局, 2020-04-27. [2021-06-25]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4/t20180427\\_1596389.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4/t20180427_1596389.html).
- [2] 周战强, 韩冬雅. 外群歧视与流动人口家庭收入. 城市发展研究, 2017, (6).
- [3] D. S. K. Lim, E. A. Morse, R. K. Mitchell, K. K. Seawright.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s: A Comparative Business Systems Perspective.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0, 34(3).
- [4] D. Chambers, J. Munemo. Regulations,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Regulatory Economics*, 2019, 55(1).
- [5] 王春超, 尹蓉娟. 创业文化环境与创业行为——以“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为例. 经济科学, 2018, (5).
- [6] 杨金龙. 社会信任提升有益于农业转移人口创业吗?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8, (5).
- [7] X. Meng. The Informal Sector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A Chinese Case Study. *Asian Economic Journal*, 2001, 15(1).
- [8] 叶静怡, 王琼. 农民工的自雇佣选择及其收入. 财经研究, 2013, (1).
- [9] D. Wang, F. Cai, G. Zhang. Factors Influencing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The Role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0, 25(31).
- [10] J. Zhang, Z. Zhao. Social-family Network and Self-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Temporary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 *IZA Journal of Labor & Development*, 2015, (4).
- [11] 李国正, 韩文硕, 艾小青, 迟远英. 社会关系网络重构与流动人口创业活动——作用机理与政策含义. 人口与经济, 2021, (3).
- [12] 林涛, 魏下海. 营商环境与外来移民的企业家精神. 宏观质量研究, 2020, (1).
- [13] 金江, 李郇. 文化差异会影响创业吗?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20, (1).
- [14] J. Tolsma, M. Lubbers, M. Coenders. Ethnic Competition and Opposition to Ethnic Inter-marriage in the Netherlands: A Multi-level Approach.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8, 24(2).
- [15] 龚晶, 赵姜. 农民工社会排斥水平测度——以北京、河南和山东农民工为例. 调研世界, 2015, (8).
- [16] J. Altonji, R. Blank. Race and Gender in the Labor Market//O. Ashenfelter, D. Card.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Vol. 3C.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B.V., 1999.
- [17] D.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8] 王静, 范秀成. 社会排斥与创造力: 被忽视与被拒绝的差异. 经济管理, 2018, 40(4).
- [19] M. 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78(6).
- [20] 王文彬, 赵延东. 自雇过程的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 2012, (3).
- [21] 国家统计局. 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国家统计局, 2021-04-30. [2021-06-25]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4/t20210430\\_1816933.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4/t20210430_1816933.html).
- [22] 曾旭晖. 非正式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研究——以成都市进城农民工为个案. 中国农村经济, 2004, (3).
- [23] W. Schultz. The Value of the Ability to Deal with Disequilibria.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75, 13(3).
- [24] 黄飞. 尊严: 自尊、受尊重与尊重. 心理科学进展, 2010, 18(7).

- [25] 魏晓娟,刘爱景.“80后”农民工常见心理困惑及对策探讨.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3).
- [26] J. Jackson, G. Rodkey. The Attitudinal Climate for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94, 58(3).
- [27] 吴义刚,荣兆梓.地区创业氛围及其作用机理——一个族群水平的创业分析架构.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5).
- [28] 钱雪飞.城乡老年人尊重需求的满足现状及影响因素——基于江苏省南通市1440份问卷调查.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27(4).
- [29] S. Corradin, A. Popov. House Prices, Home Equity Borrowing, and Entrepreneurship.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5,28(8).
- [30] 周洋,刘雪瑾.认知能力与家庭创业——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学动态,2017,(2).
- [31] B. Silver. Social Mobility and Intergroup Antagonism: A Simul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73, 17(4).
- [32] Z. Cheng, R. Smyth. Education and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021, 188.
- [33] 杨菊华.只见数字不见人:流动人口职业培训变动趋势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4,(10).
- [34] 邹静,邓晓军.居住社区选择、主观认知和流动人口的城市身份认同.人口与发展,2021,(3).
- [35] S. Djankov, Y. Qian, G. Roland, E. Zhuravskaya. Who are China's Entrepreneu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6, 96(2).
- [36] 王美艳.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与工资差异——外来劳动力就业与报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5).
- [37] E. Oster. Unobservable Selection and Coefficient Stability: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 2019, 37(2).

## Out-group Discrimination and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ship

Zhou Zhanqiang, Li Bin, Yi Chengdong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of the migrant population in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t-group discrimination against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entrepreneurship is examined. Results show that out-group discrimination has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probability of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ship. The mechanism contributing to this influence is that out-group discrimination reduces migrant workers' accumulation of soci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social respect for them decreases and as a result their entrepreneurship is inhibited. Out-group discrimination exerts an inhibiting influence on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both employers and self-employed workers, but with a more inhibiting effect on the former. Moreover, there is a more negative effect of the discrimination on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migrant workers born after 1979, moving between two provinces, and working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e policy-makers in immigrating cities should take various steps to decrease the out-group discrimination against migrant workers, establish a fair market environment, and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their entrepreneurship.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out-group discrimination; soci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social respect; urban entrepreneurship

■ 收稿日期 2021-08-13

■ 作者简介 周战强,经济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2206;  
李彬,经济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易成栋,经济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 责任编辑 涂文迁